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Zhongguo Chubanjia
Chen Hanbo
中国出版家
陈翰伯

柳斌杰 主编 孙顺华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出版家丛书
ZHONGGUO CHUBANJIA CONGSHU

Zhongguo Chubanjia
Chen Hanbo
中国出版家
陈翰伯

柳斌杰 主编 孙顺华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任 益
封面设计：肖 辉 姚 菲
版式设计：汪 莹
责任校对：白 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出版家·陈翰伯 / 孙顺华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2

（中国出版家丛书 / 柳斌杰主编）

ISBN 978-7-01-019491-2

I. ①中… II. ①孙… III. ①陈翰伯（1914~1988）-生平事迹 IV. 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30892 号

中国出版家·陈翰伯

ZHONGGUO CHUBANJIA CHEN HANBO

孙顺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6 插页：4

字数：200 千字

ISBN 978-7-01-019491-2 定价：6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出版说明

出版不仅仅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商业领域，同时，它也深深打上了“文化”和“思想”的印记。在这个文化场域中，交织着多种力量的动态关系，通过出版物的呈现和出版活动的开展，描绘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貌；而回旋折冲于其间者，则是那些幕后活跃、台前无闻的各类出版人。他们自喻“为他人做嫁衣裳”，事实上，却是国家文化传承和历史记录的主要担当者，有出版发展的参与人和见证者甚至称他们所起的作用为保存民族记忆的千秋大脑。虽然扼据出版要津之地，却少见自家行当的人物传记出版。本丛书是第一次规模化地为这个群体中的杰出者系列立传，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出版事功中，折射出近代以降出版业的俯仰变迁，同时也见证着出版参与时代文化思想缔构及其背后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那些曾经彪炳于时的出版人，一方面安身于这个行业，以其敏锐犀利的时代洞察，在市场、经营与创意中躬行实践，标领乃至规划了这个行业的发展，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门类；另一方面又在“安身”之外，显现出面向社会的公共性关怀与“立命”的超越性关怀，从职业而志业的追求中，服务于民

族解放、思想启蒙与文化进步的社会性经营，书写了出版人生的风采、风骨与风流。

本丛书所传写的 50 余位出版人，均为活跃于 20 世纪并已过世的出版前辈。中国古代也曾涌现了陈起、毛晋等出版大家，只是未纳入本书的传主范围。丛书在体例上，有单人独传与多人合传之分，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传主出版贡献及其历史地位的轻重判别，许多情况下的数人合传，乃困于传主史料的阙如而不得已的选择，某些重要出版人如大东书局总经理沈骏声、儿童书局创办人张一渠等，也囿于同样情形而未能列入本丛书的传主名单，殊觉憾事。虽说隐身不等于泯灭，但这个行业固有的幕后特征多少带来了出版人身份上的隐而不显、显而不彰。本丛书的出版，固然是想通过对前辈出版事迹的阐幽发微、立传入史，能让同样为人做嫁衣者的当今出版人不至于觉得气类太孤，内心获得温暖，并昭示后来者在人生目标上，在家国情怀上，在出版境界上，追步于前贤，自觉立起一面促人警醒自鉴的镜子；同时更希望通过一个个传主微历史的场景呈现，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出版在产业之外，更是一项薪火相传的社会文化事业，它对时代文化的接引与外度，使其成为一种任何人都不可忽视的“势力”，在百余年来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故此，我们推出这套“中国出版家丛书”，以展示中国文化创造者的风采，弘扬他们的优良传统和崇高的职业精神，发掘出版史史料，丰富出版史研究和编辑史研究。

“中国出版家丛书”编辑委员会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六年四月

前 言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是一个从无书可读到热衷读书的年代，读书成为一种社会潮流与时尚。当时的大学生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也没有人不知道《读书》杂志，但未必知道其幕后曲折的出版故事；读书人感觉到想买的书能买到了，想读的书能读到了，却不一定了解和理解出版家在风云变幻中的戏剧人生。提到汉译学术名著、《读书》杂志、80 年代图书的逐步繁荣，难以绕过的一个人物是陈翰伯。

陈翰伯（1914—1988），名烈文，字翰伯。民国时期，他是活跃于国统区的著名报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是共和国的第一代出版家。他用八个字概括自己的一生：“青春办报，皓首出书”。他一辈子和文字打交道，在文字中把握历史脉搏的跳动。

陈翰伯的祖籍是江苏苏州木渎镇，他的父亲陈受之年轻时只身一人来到天津，供职于中外合资的自来水公司，成为天津新移民。尽管是平民之家，陈翰伯从小却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接受了全程优质教

育：从严修创办的严氏蒙养院，到直隶省立第一模范小学，到天津汇文中学，再到燕京大学，都是名副其实的一流学校。中西文化兼容的城市和家庭环境、优质的学校教育，养成了陈翰伯的精神气质。

1932年到1936年，陈翰伯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受到了系统的与新闻工作相关的通识教育、新闻专业教育和新闻业务培训，这为他的新闻出版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大学生活丰富多彩，有对知识的追求，有对人类苦难的怜悯，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当然也有对爱情的渴望。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它告诉学生要通过追求真理获得自由独立，并以自由的思考和独立的人格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类。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此校训所蕴含的自由独立精神实际已融入了陈翰伯的生命中，在万安公墓陈翰伯夫妇黑色大理石墓碑上，赫然刻有“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九个大字。

陈翰伯在燕京大学的四年，介于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之间，外敌入侵，政局动荡，内忧外患牵动着每一个热血青年的心，将他们卷入到政治纷争之中。当时，渐进的科学与实业救国思想、激进的革命思想、风起云涌的学生爱国运动相互碰撞，影响着成千上万青年学生的人生选择。活跃性格和理想主义使青年陈翰伯倾向于激进，他通过竞选加入燕大学生会，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在1935年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是燕京大学请愿学生的总领队。次年2月，在结束大学生活的前几个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从此他和那一代加入共产党的知识精英一样，怀着对民主、法治、富强的美好中国的向往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以信仰为生活意义，以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为工作使命。

从燕京大学毕业后，陈翰伯开始了职业报人生涯。1936年冬，他到达西安，在张学良东北军的机关报《西京民报》先后任编辑和总编辑。此后的十二年，他辗转西安、成都、重庆、上海等地，在杨虎城西北军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任副刊编辑、国际新闻编辑等职；在成都的《新民报》负责社论；在中共和民主党派合办的《全民通讯社》成都办事处主持发稿工作；在重庆孔祥熙的《时事新报》任国际新闻编辑、资料室主任、采访部主任等职；在重庆陈铭德的《新民报》任副总编辑；在上海中共办的民间报纸《联合晚报》任总编辑。这期间，他的笔下多次出现过惊人的大标题，如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是通过《西京民报》的号外传遍全国，传向世界的。他在《联合晚报》的社评《我们的信念》里说：“我们一心想当民间的喉舌，报道真实的新闻，诉说人民的痛苦。我们要求停止内战，我们要求民主自由。我们认为内战不停止，民主自由不实现，人民的痛苦就永难解除，中国就没有前途。”报道真实的新闻，要求民主自由，是陈翰伯报人生涯中始终不变的新闻理念。

1949年到1953年，陈翰伯主持新华总社的新闻训练班、新闻总署的北京新闻学校、中宣部的宣传干部训练班，为共和国培养新闻干部达一千多人，学员被分配到全国各地的新闻机构、出版发行机构及文化教育机关，成为各单位的业务骨干。

1953年到1958年，陈翰伯调任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主管理论刊物《学习》。《学习》编委会由处长、副处长等六人组成，陈翰伯对这份工作并不适应。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在重庆、上海先后参与过三份刊物的编委会，《学习》是他办过的第四份刊物，此次办刊之复杂是他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作为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他

也发表过一些紧跟政治形势的文章。

从1958年到1966年，陈翰伯掌舵商务印书馆八年，在相对贫乏的物质条件下，他将出版的边界延展到极限，将专业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很难想象换一个人能够超越他。八年之中，他批准出版了五六百种汉译图书。按照汪家熔先生的统计，属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范围的有395种，涉及哲学及哲学史著作、经济学著作、政治学著作、历史著作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不仅活跃了“文革”前的文化学术活动，更为改革开放后的新一代学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使其部分佼佼者拓宽了思维的触角，成为了思想的先行者；让无数读书人在经历“文革”禁锢后打开了视野，接受了思想启蒙。毋庸置疑，陈翰伯对公有制的商务印书馆和共和国的翻译出版事业有筚路蓝缕之功。

在商务印书馆，行政事务性工作千头万绪，但陈翰伯仍以旺盛的精力和热情探究理论问题，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发表了三篇关于真理问题的文章。其中，在《关于科学史上的错误观点》一文中，陈翰伯以“燃素说”为例，阐发对待科学史上错误观点的应有态度。此文在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引发1962年至1963年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虽然这次讨论只限于学术界，影响力远不能与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相比，但从哲学思想的角度看，二者在反对把已有的权威理论凝固化、绝对化方面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前者对后者做了知识、方法和人才方面的准备。

“文革”初期，陈翰伯因《外国历史小丛书》被批判，罪状是“邓拓、吴晗、陈翰伯通过合伙搞《外国历史小丛书》进行反革命活动”，被关进“牛棚”，后来又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1972年，陈翰伯重回出版界。1978年，他出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主持工作。作为出版管理机构的领导人，改革开放的时代给他提供了表达思想、施展才能的舞台，也赋予他更大的使命。他以数十年摸爬滚打、独立思考历练的卓识，以再次燃起的负重致远的热情，身体力行地推进思想解放，推动破除出版领域的思想禁锢，在较短的时间里扭转了十年浩劫造成的严重书荒局面。

在主持国家出版局期间，陈翰伯敏锐地认识到“解放思想”对中国发展的伟大意义，也清醒地看到“解放思想”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长期和艰难的。为了突破思想禁锢，活跃学术思想，陈翰伯与陈原、范用、冯亦代、史枚等出版界同人筹划创办了《读书》杂志。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号一发行，立即在思想、文化、学术领域引起极大反响，它提供的思想成果和文化视野影响了无数知识分子。陈翰伯亲自给《读书》杂志提出了改进文风的11条建议，如废除空话、大话、假话、套话，不要穿靴、戴帽等，不仅针对“文革”中的恶劣文风，对当今也不无警醒价值。针对《读书》创刊号开篇文章《读书无禁区》引起的巨大争议，陈翰伯亲自撰写《两周年告读者》重申“读书无禁区”。他说：“本刊提倡读书之风，思考之风，探讨之风，和以平等待人之风，期以蔚为风气。越来越多的人有此四风，对于克服官僚主义、改革领导体制，促进我国‘四化’都会发挥无穷无尽的思想力量。”

陈翰伯主持国家出版局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但他任职期间锐意改革出版体制，不搞“长官意志”，也决不做“无意志的长官”。其一，用“立足本省（后来改为立足本地）、面向全国”的方针代替地方出版社“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方针，不仅突破了“文革”设置

的禁区，也突破了“文革”前十七年既定的妨碍出版发展的条条框框。事实证明，让地方出版社同京、沪两地的中央出版社和部属出版社展开平等竞争，有利于提高整个出版界的活力，对促进全国出版事业的繁荣和持续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二，他主持整理、修定了《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在出版社原有的政治任务之外，加上了“传播、积累科学文化技术知识和成果”、“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两项任务。其三，他主张制订《出版法》。陈翰伯于1980年10月9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提交了一份报告：《如何保障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在这份报告中，他直面现实，以文化的繁荣活跃、社会的长治久安为目标，提出了一些落实出版自由的具体办法，并提议：“立即着手进行调查研究，制定我国的出版法或新闻出版法，使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得以正确地贯彻执行。”

1982年，陈翰伯卸任国家出版局行政职务。此后，他以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和名誉主席的名义关注出版动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陈翰伯的一生，有近四十年的图书出版经历。20世纪40年代，他在重庆管理过朋友合办的中外出版社；50年代后期开始掌管公有制的商务印书馆；“文革”时期经历图书大扫荡和人生厄运；70年代重回出版界，晚年先后任国家出版管理机构领导人和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丰富的出版经历将他磨砺成一名出色的出版家，他的出版理念和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而出版。出版家陈原在《记陈翰伯》的纪念文章中说：“无论是在六十年代还是八十年代的旅行中，翰伯总是用不同的方式启发我思考一个问题：为了提高全民族

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该奉献什么，我们能奉献什么。”这样的出版境界与他青年时代开始养成的家国情怀分不开。

二、主张制定出版法或新闻出版法，实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他认为通过法治解决我国社会内部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问题，有利于从政治上、思想上团结和争取大多数，长久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

三、主张图书出版要兼容并包。他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任何一个新观点、新理论的创立，永远和当时历史时代有必然联系。正确的观点固然如此，错误的观点也不例外。正确的观点和错误的观点虽然不能发生同等的作用，但是对于后人，它们都能起思想材料的作用。”这种对图书和学术思想的包容开放态度，使他在汉译学术名著出版和破解“文革”后的“书荒”方面成就卓著。

四、主张出版要尊重书籍特点。他认为图书出版是生产精神产品，书籍的特点之一是系统介绍各种知识，供人们长期使用，从写作到出版时间周期长；书籍还有一个特点是种类众多，“有宣传党的路线、政策、方针的，有提供比较稳定的知识的，有作为文化积累的，有作为工具查阅的，有作为科学研究用的，有为了丰富文化生活的，也有为了提供反面材料的。”他认为不能把所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政治捆绑在一起，特别强调学术理论著作要百家争鸣。

这些出版理念和思想是一位老出版家的毕生心得，是留给出版界的宝贵财富。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平民之家 书香少年	001
一、身世	001
二、书香少年	007
第二章 燕京大学 新闻学子	019
一、就读燕京大学新闻学系	019
二、学生会职员	029
三、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	038
第三章 报人生涯 另类潜伏	053
一、初出茅庐	053
二、活跃于成都、重庆新闻界	064
三、上海《联合晚报》的总编辑	078

第四章 香山执教 桃李天下	096
一、从“白区”到“红区”	096
二、从新闻训练班班主任到新闻学校校长	100
三、讲授国际时事课	107
四、校长的日常做派	117
第五章 掌舵商务 承前启后	126
一、从《学习》杂志编委到商务印书馆总编辑	126
二、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出版	135
三、对真理的追问	158
四、出版中外文辞书	161
五、出版《外国历史小丛书》	166
第六章 家国情怀 勇拓新枝	174
一、重回出版界	174
二、辞书出版十年规划及实施	181
三、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	190
四、破解“书荒”	196
五、《读书》与“读书无禁区”	208
六、未竟之志	217
陈翰伯编辑出版大事年表	222
参考文献	233
后 记	238



一、身世

1914年3月14日，陈翰伯出生于天津。

此时离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相去两年，帝制已灭，新局正开。民国初年的天津，早已是闻名全国的大都会，大街上，人们或西装革履，或长袍马褂，新的旧的、土的洋的，汇集在一起，透露出这座城市的中西兼容、古今并蓄。

在天津，不同于传统的新局面其实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即已开启。天津是明代的“天津卫”、清帝国的畿辅首邑，也是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1860年以后，天津辟为通商口岸，英、

法、美、德、意、日、俄、比、奥等国相继在天津设立租界，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海河两岸九国租界并存共生，数十年间，天津发展为仅次于上海的大都市。

开埠后，西方文化迅速进入天津，特别是租界内一派西式风情。1888年《中国时报》曾这样报道天津：“一度遍地皆是深沟、大洞、臭水沟的使人恶心的可恨的道路被铲平、拉直、铺平、加宽，并且装了路灯，使人畜都感到舒服。与此同时，城壕里的好几个世纪以来积聚的垃圾也清除掉了。”^①

城市环境的变化只是表面，深入一点，便会发现天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机器制造等近代工业，铁路、轮船等快捷的交通方式，电报、电话、电灯、自来水等便利的生活手段，公园、体育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报刊、出版、学校等文化教育事业，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现代理念及相关制度，等等，这些数千年中国不曾有过或被忽略的东西，都逐渐出现在天津人的生活中。

从西方人踏上天津这片土地起，随着时光的流逝，西方文化从物质到精神，从思想观念到日常起居，逐渐渗透到天津，影响着天津人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人们直接感知到西方人物质生活的富有、科学技术的先进、教育出版事业的发达、社会管理的文明。尽管质疑声、反对声从未消停，但学习、效仿西方逐渐成了时代潮流。无论官府、民间，也无论社会名流、平民百姓，都或多或少、或主动或被动、或深层或表面地与西方文明扯上了关系。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主政天津达25年，他倡导效仿

^① 《中国时报》1888年11月3日。

西方，大办实业，把天津变成了全国洋务运动的中心。

开埠和洋务运动促使天津城市建设迅速发展，工商贸易、交通、通讯、教育、报刊等都日渐兴盛，吸引着全国各地人口流入，富商巨贾、官绅士人、平民百姓纷纷来此地谋求生存和发展，这其中就包括陈翰伯的父亲陈受之。

陈翰伯祖籍是今江苏苏州木渎镇^①。木渎在苏州城西南约5公里处，是沪、苏、浙交界之地。这里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相传春秋末年吴、越相争之时，越王勾践巧施“美人计”，将美女西施献给吴王夫差，吴王专宠西施，特为她在秀逸的灵岩山顶建造“馆娃宫”，又在紫石山筑“姑苏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连年大兴土木，致使木材堵塞山下的河流，“木渎”之名由此产生。传说往往虚虚实实，真假难辨。而真实的木渎镇在清末已是著名的江南水乡，一条河流自西而东穿过古镇，涓涓河水流淌不息，流向了京杭大运河，也连通了木渎人和外部世界。优越的地理条件，使苏州包括木渎在内成为经济富庶、教育昌盛之地。

陈翰伯的祖父在镇上开着一家小商铺，准确点说，是间杂货铺。陈延琳2016年5月12日的信中说：

祖父原籍苏州木渎镇，祖父的父亲好像是开小铺的一般商人。

2016年6月15日的信中补充道：

^① 原属江苏吴县，陈翰伯在燕京大学履历表中填写的籍贯是江苏吴县。